

# 以文艺杰作守护新征程中的人民之心

□王一川

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路途上,文艺应该怎样做才符合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从文艺繁荣发展看,这就是要求以新的文艺杰作去守护新征程中的人民之心,也就是应当满足在新征程、新境遇中人民通过艺术审美而更加透彻地感知新的生活世界、品味人生意义、洞悉未来远景、提升精神境界等新需要。这是因为人民的心不会单独停留在过去百年文艺功劳簿上流连忘返,而是产生新的更高的文艺杰作鉴赏期待。

新的更高的文艺杰作鉴赏期待的产生,表明中国人民之心正在这个“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时刻发生新转变。过去百年,伴随着中国社会从古典性到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民之心也在实现从破碎的古典梦到现代中国梦的转变。鲁迅带着难以转变成为“现代人”的大恐惧,打破沉溺于“国粹”而难以自拔的自大幻觉,通过塑造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不朽的艺术典型,发出改造“国民性”、重铸中国魂的激越“呐喊”。99年前,那时还是大学生的美学家朱光潜曾在文章里痛感那时中国人心灵的病态和腐朽状况,发出“我们也要换个心才好”的愤激呼唤。这种对现代心灵的关注成为这位现代美学家一生探寻的不变的焦点。如果说,过去百年中国人民已经形成了自觉而自主的心灵,那么,在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的新征程中,中国人民可能迎来更加自信而自强的心灵回归。如果说,自觉而自主的中国心灵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从古典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趋向,力图在与外国现代心灵的对话中重新找到自身的现代性重建轨迹,并且同时探寻让衰败的古典心灵实现现代型转化的可能途径的话,那么可以说,正在形成中的自信而自强的中国心灵可能会烙铸出如下新特点:充满自信地传承自身的古典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传统,开放而又平等地吸纳外国文化艺术中的优秀成分,寻求与外来文化艺术平等对话、互鉴互通,目的是涵养独立、自主和自强的中华民族品格。假如这种比较和展望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现在需要考虑如下问题:文艺界拿什么去守护新征程中的人民之心?

守护新征程中的人民之心,首先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为了人民。在新征程中,中国人民会对文艺产生新的需要,这就要求文艺家和文艺管理者不能停留于对过去百年境遇下人民之心的旧有理解,而要切实认知和理解新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之心的新境遇和新需要。自信而自强的中国人民,业已不满足于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有状况,而是向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艺术杰作”或“文化杰作”等高远目标。这就要求抛弃以往那种只管图解政策而不顾长远目标、只讲数量而不讲质量的低级做法,转而把新的艺术佳作或艺术杰作的创作置放在首要地位,千方百计地以文艺佳作或文艺杰作去回馈和守护人民的自信与自强之心。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悉心体验自信而自强的中国人民的生活世界和心灵状况。当中国人民全部脱离“极端贫困”而过上“全面小康”生活之际,置身在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境遇下,还会有新的“不平衡”发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东部生活与西部生活之间、乡村振兴与

乡村脱贫之间、不同行业或岗位之间,都可能发生新的“不平衡”,以及相应地出现为改变“不平衡”状况而竭力奋斗的形形色色的鲜活故事。这就会为文艺家的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社会生活源泉。文艺家只有深入这个生活世界的大海中去体验和把握这种“不平衡”的微妙波涌,才有可能找到新的艺术杰作赖以产生的活生生的创作感兴。

不仅讲述新征程中的人民的生活是重要的,而且怎样讲述新征程中的人民的生活更应当提到优先位置。这是因为人民总是愿意接受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而不愿意接受那种动辄板着脸孔训人、甚至面目可憎的表达。文艺家光有好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资源都是不够的,更需要把好的创作动机和好的创作资源都兑现为好的表达方式。近两三年,一些文艺作品,包括重大主题文艺创作,在新的表达方式探索和创造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电影《流浪地球》改编自中国作家刘慈欣写的科幻小说,在中式科幻大片上迈出崭新的一步,表明中国人已经拥有创作自己的科幻大片的强劲实力和巨大潜力。《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相继以小故事组合的新颖方式,通过塑造无名小人物形象,在传达人民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上开辟出新的正剧或以喜为正的影像美学道路。《悬崖之上》以悬念迭出、惊险刺激、动人心魄的谍战片方式,讲述银色雪原上红与黑的残酷较量,突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的感染力。《1921》别出心裁地选择李达和王会悟夫妻联袂筹办建党会议的特定视角,渲染“摩登”上海的开放性和现代性魅力,在诗意化浪漫青春氛围中刻画毛泽东等早期领导人艰苦创业的故事。《守岛人》以叠小成大出典型的新颖手法,把平凡而不凡的民兵英雄王继才的故事讲得入情入理,形神兼备。电视剧《大江大河》没有满足于“好人有好报”的俗套,大胆地写出了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宋运萍等改革时代人物的不同的人生际遇和结局,体现了“大浪淘沙”式历史兴亡意识的巨大力量。《山海情》不仅突出了闽宁帮扶所产生的脱贫攻坚力量,更深挖出六盘山麓涌泉村李马两姓长期相濡以沫的泥土情怀,展示了地缘美学密码的强大表现力。《装台》通过西安“城中村”的底层生活而塑造出刁顺子、刁菊花、蔡素芬等人物形象,特别是在刁顺子的憨愣性格刻画上取得了成功。《觉醒年代》之所以能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而刻画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元培、胡适、辜鸿铭、林纾等五四人物形象,恰与其艺术典型化再构型努力紧密相关,通过文艺典型化手段而让百年前历史人物重新释放出群雕般引人注目的性格光彩。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设计出富于江南水乡特色的雨中黑衣人伞舞、街头黑衣人群舞、兰芬怀抱长衫与李侠的双人舞、兰芬的独舞及蒲扇舞、一群旗袍女性在悠扬婉转的《渔光曲》中跳起的蒲扇舞、短凳舞,以及兰芬与李侠的四组双人舞等,渲染出上海的地缘生活氛围,凸显出地下工作者以柔润润的现代型传统美。今年的河南卫视艺术节目《唐宫夜宴》《芙蓉池》《纸扇书生》和《端午奇妙游》系列等,之所以能够连珠炮般地在观众中产生“爆款”或“破圈”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精心运用了观众喜欢的艺术样式和手段,将河南地缘美学密码的表达潜力展示出来。这些事例充分地说明,只有以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讲述人民的生活故事、满足人民的愈益高涨的审美需要,才会真正产生守护人民之心的作用。

在新征程中为人民不断奉献新的文艺

佳作或文艺杰作,才可能真正“守”得住“人民的心”。展望未来,每年都会有新的主题文艺创作机遇,更有新的来自生活世界的挑战发生,想必都会给文艺家的新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感兴。当此之际,有一些相关问题有必要提出交流和探讨。首先,任何一部主题文艺创作,都不应满足于仅仅及时地完成政治或政策表达任务,而是务必走出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循环怪圈,切实地按艺术佳作或艺术杰作的高标准来筹划和管理,志在为人民、时代和民族奉献新的艺术杰作。

其次,无论何种主题文艺创作任务,都需要以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式去组织,特别是应当播撒在文艺家自身的厚实的生活体验沃土之中。据《山海情》创作团队介绍,他们最初接受这个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任务时是不情愿的,因为自知缺乏来自这一生活土壤的底蕴的支撑。在履行上级布置的这项主题创作任务的过程中,起初的几稿剧本也都不理想,单纯为了显示宁夏镇的前后巨变而编的故事无法感动人。后来继续深挖六盘山麓深处贫困山区人民的故土情怀,才终于找到故事动人的关键点:贴近贫困山区人民与故土的难舍难分的深厚情怀,展示不同家庭和个人的各自的地缘心灵史,以便唤起全国电视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和共情。假如这部电视剧没有取得这一关键突破,而是勉强按照开初的方案去写和摄制,必然无法出现《山海情》这一动人心魄的电视剧佳作。

再次,选择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方式十分重要。越是重要的主题文艺创作任务,越是需要寻求人民喜爱的艺术样式和手段。除了上面提及的《山海情》《装台》和《觉醒年代》等佳作之外,刚刚回世的建党百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之所以能够受到普通电视观众的喜爱,正是由于采取中国传统写意美学及其导引的音乐、舞蹈、戏剧、雕塑、诗歌等跨门类艺术交融方式,充分调动国家体育场先进而优越的场地条件及相关技术条件,高度简约而凝练地渲染建党以来百年关键时间节点动人故事片段,小中见大、平中见奇地给予一代代革命先辈之鲜血和坚定奋斗目标所凝聚成的曲折而辉煌的百年党史以传神的表达。这种中国式写意传神艺术方式显示了通常的写实方式所没有的来自本民族艺术传统的深厚力量。

最后,在创作人民心灵的艺术杰作的过程中,有一点也不可或缺:文艺评论界应当以真正的“批评精神”去发表评论,为更多文艺佳作或文艺杰作的诞生,切实起到人民需要的褒贬贬劣、激浊扬清等作用。特别是文艺事业界、文艺产业界、文艺管理界、文艺媒体和文艺家等相关各方,不当仅仅听取和保留评论中入耳的好话而删除其中的刺耳的批评或建议,而是允许和鼓励文艺评论工作者好说好,劣处说劣,特别是坦然让其挑出现有问题或不足来研讨,目的还是为了未来的持续改进和提高,以便有更多更好的文艺佳作乃至文艺杰作陆续问世,不断回馈人民之心的信赖和期待。同理,文艺评论工作者自身也需要有随时接受反批评的度量,向优秀文艺家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专业鉴赏水平。当然,理想的方式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艺评论者与文艺家之间互为“诤友”,形成相互之间平等而直率地对话和交流的惯例,共同促进好作品的产生。而这也应当是中国文艺在新的征程中不断繁荣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优质条件之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 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上接第1版)新中国成立后,刘江笔耕不辍,写出《太行风云》《烽火摇篮曲》《一滴水中看太阳》等作品,用文学的筋骨去纪念、传承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脊梁和精神血脉。

“赵亨德领导的敌后武工队是抗战史上的传奇,他是我曾经的采访对象,也是我曾经的亲密战友。因为他,我从一名战地记者成长为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侦察战士;也是因为他,书写英雄、礼赞英雄成为我后来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1944年八路军从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组成武工队、侦察队,深入敌后作战。赵亨德领导的敌后武工队建立边区交通站、伏击正太铁路、活捉日本少将,被敌人誉为“正太铁路拦路虎”。为了能采访到这位大英雄,刘江放弃了在司令部工作的机会,深入到敌后作战第一线,成为赵亨德武工队的一员。

“刚开始去采访,他们不大配合我的工作,对我这种耍笔杆子的人有点不以为然。面对这种情况,我没有退缩,索性跟着他们一起打鬼子。日子一长,我也成为侦察队的战士,和大家一样端着枪俯卧在铁路旁,跟着他们一起炸敌人的军用火车。但是每到真正危险的时候,赵亨德没有忘记我是战地记者,总是想办法保护我。在一次行动中,我们把敌人的军车炸成了两节,但是敌人仍然负隅抵抗,用尸体做掩体。直到枪声停止,我看到日本人的尸体堆里有一节露出来的枪头,就想把它拔出来,还没等动手,枪就响了,我身后战士的下巴右侧立即就被打烂了。

如果不是赵亨德拉住我,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赵亨德让大车先撤退,自己留下来爬上火车顶,用炸弹炸死车厢里的敌人。”

“在一次战斗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我当时就哭了,但是比我还小几岁的他却说:‘哭什么,这是战争时期,要没命早没命了,你怎么还闹这一套’。赵亨德牺牲在解放平定的战役中,年仅26岁。无论是作为他的战友,还是一名文字工作者,我都有责任把他传奇、英勇的一生写下来。后来我创作的《太行飞虎队》和电视剧剧本《太行一等杀敌英雄》都是以赵亨德为原型的。革命者为信念而活的精神令人感动,也许对今天的一些人来说很难理解,但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出生入死,不计得失。”

“在战争年代,太行山是我们与敌人作战的屏障;在和平年代,太行山是我取之不竭的创作土壤。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永远与革命历史相连、与太行山漳河水相连、与人民与时代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刘江先后担任《太原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省出版局、山西省文化厅、山西省委宣传部等多个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然而,太行山的烽火岁月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1958年作家赵树理从北京回到山西,在一次座谈会上,刘江谈到了自己想要创作一部反映太行山革命风云的作品的想法,得到了赵树理的鼓励。195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太行风云》在全国引起轰动,成为描写农村革命变迁的经典之作。小说通过对以观

音保为代表的青年农民形象的塑造,让人们看到无产阶级观念对农民思想意识改造的重要意义,将中国农民的精神动向和心理变迁放置于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之中,充分显示了刘江文学表达的“人民性”视野与情怀。在他从事文艺创作70多年、创作600多万字的写作生涯中,太行山是他永恒不变的书写主题。

刘江这样谈到其作品与太行山的紧密关系:“很多人评价《太行风云》写出了不同时期中国农村革命的风貌,写出了太行山人民生活的格调,语言富有山西地方特色。其现实在看来,这部作品也有很多不足,但就是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是吃着太行山的小米、南瓜长大的,是多少次被太行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救下的。可以说我的生命早已与太行山脉融为一体,这些故事和语言都是来自太行山,来自太行山的人民。”

“现在,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是要增强文艺创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刘江说,“作为一名作家,你对生活的体验有多深刻,你对变革的把握才能有多宏阔。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也许我们对文学人民性的理解有着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但是其基本的立场是不变的。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我创作《太行风云》是为了表现太行人民的自主意识、自觉意识被革命所唤醒,那么到了新世纪,我创作《剑》《韶华时代》等一系列反腐题材的作品,则是希望通过聚焦改革中的艰难、现实中的问题,展现出人民愿望的另一面。在我看来文学的人民性、时代性永远都过不去。”



## 文学要与时代同频共振

——返观“八十年代文学”

□吴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在延续1977年思想解放热潮的同时,进一步提供了直接正面讨论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历史问题的契机,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肯定。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并明确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历了这一历史转折,我们迎来了繁荣的“新时期文学”,也就是后来大家更为熟悉的“八十年代文学”。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文艺界致辞,明确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并且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对于文艺界而言,不啻是一枚定海神针,有力地打破了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精神枷锁,开辟了更为多元、丰富的话语空间,使作家们切实感受到心灵的解放和自由。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

以上开阔、包容的方针政策对之后八十年代文学的创作繁荣和思想活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八十年代文学在党的领导下,深度契合国家层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加之影响遍及全社会的思想解放浪潮,在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时代变迁的同时,又锐意进取,不断求新求变,对于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多次承担起社会变革中的风向标角色,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

以1985年前后为界,八十年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文革”结束后,大量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小说方面,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发端,预示了文学解冻的重要征象。文学创作的繁荣,甚至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国家层面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并将相关文学命题,如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等,引向深入。随后的反思文学即是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对历史做进一步叩问和审视,这其中涉及到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问题。改革文学的产生则是因应了在“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下,当时各行各业的改革浪潮。其中《乔厂长上任记》就塑造了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乔厂长这一人物形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文学思潮的产生得益于它们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勇闯禁区,扮演着先驱者和急先锋的角色,从而在题材和主题上进行了有力突破。

同时,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两大主体是知青作家和归来作家。以知青作家为例,出现了叶辛的《蹉跎岁月》、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等表现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需要说明的是,知青一代作家始终有作为同龄人、同路人的评论家,如王晓明、陈翔、黄子平、吴亮等,及时批评、相互砥砺,形成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同步发展、彼此激荡的动人局面。归来作家中,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蝴蝶》等作品开启了意识流的新颖手法,在小说艺术层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高晓声则以“陈奂生系列”深刻描绘了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的多重影响。诗歌方面,归来者吟唱“归来的歌”,青年诗人则有“朦胧诗”创作,两者都指向了对历史的反思,但后者的怀疑、反叛精神格外强烈。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取材和主题具有鲜明的干预意识,文学一度成为当时公众生活的重心,具有强烈的轰动效应。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营造的宽松、包容的舆论环境和文学生态。

1985年,我们迎来了“85新潮”。这是文学界在艺

术上力求突破旧的话语模式和写作范式的有力尝试。这一时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成为新的历史诉求,背后隐含的是告别文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历史情境。日常生活、地域风俗文化、个人写作、文学的语言和叙述等问题更加强烈地进入作家视野。不容忽视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度影响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在此前后,市井小说、风俗乡土小说、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第三代诗歌等陆续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日益多元的文艺格局。同时,在“纯文学”理念的倡导下,这一时期对于文学创作艺术层面的探索有了高度飞跃,一大批作家创作出极具个人风格的代表作。

八十年代,国家层面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大力引进西方现代科技和管理技术。在这一大环境下,外国文学翻译(包括西方文论)成为当时译介的重点。作家和批评家通过阅读“外国现代派”的相关作品,积极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路径和新空间。新一轮文学翻译浪潮加上随后的作家出访,推动着新的文学思潮的形成。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相继发表,当时被称为“现代派小说”。风俗乡土小说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治生活作为社会、文学结构中心这一理解的退隐。正在展开的现代化进程需要作家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去观察转型时期的城市和乡村。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认为文学应该突破表面化的现实层面,发掘本民族古老文化的深厚土壤,与世界文学展开真正的对话。这其中以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为代表作。

先锋文学作家在语言和形式层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和探索,其创作关注点也从“写什么”转到“怎么写”,出现了马原的《虚构》、余华的《现实一种》、格非的《迷舟》等进行多种叙事尝试的作品。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前者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探索,后者聚焦叙事的探索。其背后都潜藏着文学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冲动,这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和与世界接轨成为当时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换言之,即使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纯文学”或“去政治”的艺术探索,其背后也隐含着如何回应“讲述话语的年代”这一问题。“文学现代化”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深层主题和内在线索。

探索、突破、求新求变是八十年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也是贯穿八十年代始末的时代精神。国家层面营造了开放的时代氛围,人们精神状态健康明朗,社会生活积极向上,普通民众与国家层面在大的历史目标和未来设计上具有高度的共识性,向心力因此得以凝聚而成。八十年代文学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潮和历史转折为起点,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冲动和热情。文学工作者作为其中最敏感于时代氛围的群体,在宽松的文学生态下,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追求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学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跃动。比如勇闯禁区,突破题材的限制(前期有暴露社会问题、重新呼唤人情人性等,后期有细致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度呈现人物的潜意识等);从人情人性出发,创造出许多难以简单界定,更为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尝试多种美学风格(如悲剧、喜剧、反讽等);运用意识流、多种叙述人称等写作手法。

文学向来是时代敏感的神经,八十年代文学尤其表现出蓬勃有力的创造性和锐意革新的探索精神。某种程度上,八十年代文学是在回应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基础上,基于我们对于现代化的共识和想象展开的,至于“现代”的故事如何讲述,什么样的讲述才称得上是“现代”的,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这背后关乎不同作家如何回应“时代”的问题。也因此,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学丰富、多元的文化格局。八十年代文学在前后两个阶段,既深刻与时代共振,同时,又深入了时代肌理,在与时代一起摆荡、缠斗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今天,当我们作为研究者重新谈论“八十年代文学”,除了需要以历史化的方式对于八十年代文学的演变进行更为耐心、深入的动态描述和细致呈现,更需要着眼于当下和未来。事实上,我们每一次对于历史的重返都隐含着当下的需求和召唤未来的冲动。八十年代文学作为历史转折的重要阶段,它是如何把“过去”告诉“未来”,将“旧迹”带入“新途”,如何在连续与断裂的动态辩证过程中开辟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对于这一脉络和线索的清理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激活八十年代昂扬、向上、探索、革新的思想精神资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 纪录片《爱上中国》央视播出

本报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推出的6集纪录片《爱上中国》日前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绿》栏目播出。该片用珍贵的影像讲述国际友人投身中国革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感人故事,以他们和家人的亲身经历,展现了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

《爱上中国》选取了与中国共产党一同栉风沐雨的多位国际友人,如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伊莎白、国际著名记者伊萨雷尔·爱泼斯坦等,展现了他们与中国结下的情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绿》栏目历时6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进行纪实性的拍摄,追踪记录下这位百岁老人的独家影像。(央广网)

彭拜同志逝世 洪哲燮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联离休干部彭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7月5日在合肥逝世,享年98岁。

洪哲燮,中共党员。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汉苑血碑》《红颜幽梦绕香山》《斜阳梦》等。